

松之辑

王晓平 主编

日本

近代汉文学

高文汉 著



人

文

日

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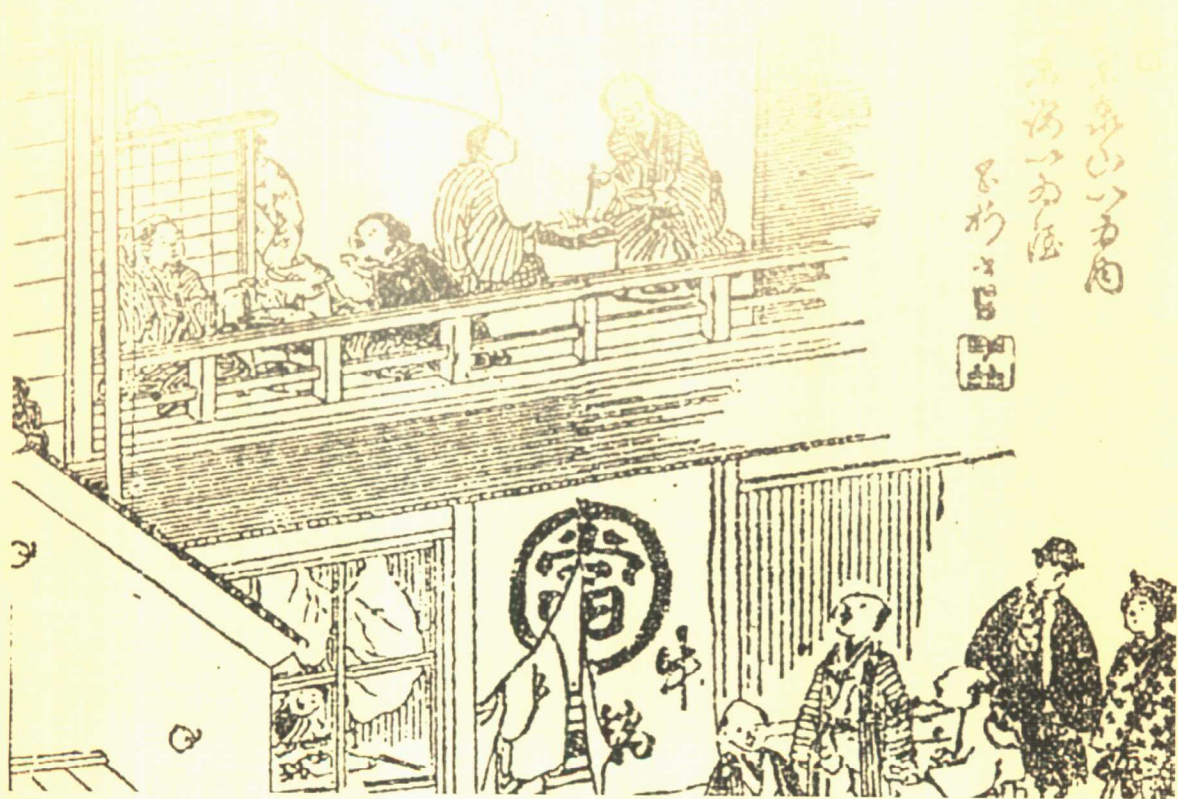
新

书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日本近代汉文学

高文汉 著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日本近代汉文学 / 高文汉著. — 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05.4

(人文日本新书 / 王晓平主编)

ISBN 7-227-02907-7

I. 日... II. 高... III. 汉语-文学研究-文学史-日本-近代 IV. I313.09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023267号

日本近代汉文学

高文汉 著

责任编辑 哈若蕙 周立军

装帧设计 吴海燕 杨少飞【小狼工作室: 0951-5012113】

责任印制 樊建强 来学军

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 5045311

邮 编 750001

网 址 www.nx-cb.com

电子信箱 nrs@public.yc.nx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880×1230mm 1/24

印 张 8.75

字 数 180千字

版 次 2005年4月第1版

印 次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0001—3000册

书 号 ISBN 7-227-02907-7/I·747

定 价 29.80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

◎
人
文
日
本
新
书

丛书编委会

【丛书主编】 王晓平

【顾 问】

中西进 川本浩嗣 乐黛云 严绍璁 文洁若 严安生

【编 委】（按姓名笔画排列）

马兴国 卞立强 王金林 王若茜 王 勇 王晓平
刘立善 孙东临 严绍璁 李 征 林少华 邱 岭
陈德文 陈生保 胡令远 郑民钦 哈若蕙 高 伟
高 宁 高慧勤



違いの認識は異文化理解の出発点
——「人文日本新書」出版を祝して



认识差异是理解不同文化的起点

——祝贺“人文日本新书”出版

日本大手前大学校长

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川本皓嗣

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



在日本，以前常听到“同文同种”的说法。日本人相信自己和中国没有多少不同的地方。近代以前，那样热心地学习汉学，是因为不是把它当作中国固有的学问，而是认为它是普遍的“人”的学问。但是，其结果，就产生了一个错觉，那就是以为学习同“文”者就具有相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，直到近代以后这种错觉仍然存在。

另一方面，中国人虽然一点也不认为自己像日本人，但就像美国人多觉得加拿大像是美国的一部分或者一个“准州”似的，中国人不也觉得日本文化像是中国文化浮浅的模仿或者派生物吗？

当然，这两方面都是很大的错觉。而且，不用说，对不深知的对手却以为知之，这是极其危险的。没



有看透相互的不同，双方都认准同样的“常识”是通用的，于是便容不得细微的龃龉，对不解的对方态度焦躁起来。

理解不同文化的第一步，就是认识相互的差异。从相互是不同的这一点出发，那么粗看起来是“不当”的“出格”的东西，实际上作为有魅力的、有启发的、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人的文化的一种形态，正是可以如实接受的。

宁夏人民出版社不久以前出版了钱林森主编的《跨文化丛书·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》(全十卷)，在重新审视世界主要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往和相互理解方面，取得了划时期的成功。这一次又聚焦于邻国日本文化与中日关系，进而推出更大规模的王晓平主编全数十卷的“人文日本新书”。它们都是第一流的学者新写问世的最新研究成果，以深掘问题所在、精读原典、并面向一般读者好读易懂为主旨。

其中既有和歌、《万叶集》、谣曲，也有大江健三郎、村上春树、吉本芭娜娜；既有日本的敦煌文书、唐诗、《长恨歌》、《三国演义》，也有在唐留学过的高僧空海和最澄；既有东洋学与儒学，也有相扑和漫画；既有原始宗教、民间故事，也有风花雪月、恋爱和旅游，还有对不同文化间误读的研究。真可以说尽善尽美。

这套新书，辨明中国和日本的不同，无疑对于中日关系更加亲密会做出巨大的贡献。有中国方面这样的壮举于前，日本也不能不认真行事。

2004年6月





“新書人文日本”の序文

“人文日本新书”序

王晓平

数到与我国文化关系密切的别种文化，不论是说古代，还是近现代，日本文化都要算其中之一。今天，两国文化结束了以单向流动为主流的文化交流史，开始了更加频繁、更加深刻的相互作用的进程。在许多文化领域里，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小同而大异。

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举出很多，最简单的一点，就是两种文化的相邻关系。地球村内，比邻而居。如何看待对方，如何与对方相处，既是每天要解决的课题，又是一个解决不完的课题。因为对方在变，自己也在变。由于相邻，其共同点和相异点的效应都被放大。前者使两种文化彼此发挥着镜鉴和舟渡作用，后者使彼此的摩擦和冲撞频率倍增。

还有一点，那就是中日两国民族都有珍视人文的传统。试想，如果古代日本没有这样一点，中国文化便不会在那里产生那样巨大的影响。同样，如果中国文化没有这样一点，恐怕近代日本文化也不会带给中国文化那样多的新内容。而各自的人文，却有着不同的内涵。我们常常被两国文化的相似点和共同点所迷惑，将它夸大

而且忽视了各自原本不同的背景和文化环境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在建构现代文化的过程中，两国传统文化都正在起着重要的作用。尽管两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，然而如何利用传统文化资源，以发展国际化时代的新文化，两者面临着相似的挑战，而其选择则往往大相径庭。我们正可以在这同与异的辨析之中，增长很多见识。

对于我们邻国的文化，我们需要有深度认识。

研究日本，不仅是它的政治经济，也包括它的历史传统、价值体系、社会结构、文化特征等，这种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。关于日本文化的特点，日本学者有许多阐释，例如杂种文化论、优等生文化论、换装文化论、换车文化论、日本文明论、第五种亚文化论等等。关于与中国文化的关系，日本学者也有很多说法，例如卫星文化论、非卫星文化论、先为卫星文明后为非卫星文明论、同母文化论、异母文化论等等。不可否认，这些说法有的在说明日本文化的某个侧面时曾起到过一些作用，不过它们是否都概括准确另当别论。仅靠这样的判断，能否深刻说明日本文化的传统和现代，是很值得怀疑的。日本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，又通过各种思潮的合力始终与其保持着距离。日本文化不仅历史上独自走过了漫长的路，而且今天也与我们各在一途。一句话，用我们自己的眼睛把日本文化看清楚，用我们自己的话把它说个明白，研究出深度，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。

这种研究，首先是为了中国文化的发展。西方世界虽然对中国与日本都有不少出色的研究成果，值得我们研究与吸取，但是从总体上，没有跳出西方价值中心的



圈子，用的还是从西方文化中抽取出来的框架和概念。中国学者应该对日本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。凝眸中国，守住本土情怀，是今天日本文学研究的生命线，而我国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，义理、辞章、考据之学的优厚积累，则是我们能在这一领域内掘进的推动力。

同时，今天我们发展经济的大文章，是在市场日益国际化的环境下做的。发展民族文化的大文章，也要在多元文化共存的背景下做。这两篇大文章跟国家的“硬国力”和“软国力”有很大关系。不断应时而变，调整与别种文化的关系，显得格外重要。在今天，研究域外文化，已经不仅是为了实施“拿来主义”，为了“洋为中用”，因为我们不能“拿来”，或者暂时不能“拿来”，不能为我所用的，有些也需要我们去跟它打交道。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在前所未有的大环境中自处和发展的基础，同时也要有更大的眼界、更敏锐的洞察力、更强的免疫力和应对能力。

从这一点出发，我们就不仅期望有“人文日本”，而且更期望有“人文印度”、“人文阿拉伯”等等。在我们不断推出自己研究成果的同时，倾听他者的声音也是必要的，这样，像“人文日本译丛”这样的选题，相信也在期待之中。来自外部的“单边主义”或者变相单边主义的压力、锁进不锁出的新“锁国心态”和内部对多元文化共存现实的“不适应征”，不会因为经济的强盛而自然消失，需要的是不懈的沟通磨合和彼此对视，这一点不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，其实都是一样的。

从学者个人来说，恐怕也不难感受到学术环境的变化。社会文化结构变化剧烈、雅俗界线模糊、生活节奏

加快、信息需求猛增，知识分子对非本专业知识需要的范围在扩展，而可能用于阅读的时间却在减少。学术著作，不仅需要以严整透彻的面孔登场，也需要以比较轻捷亲切的面孔，走进大众中间。在把学术书写“正”之外，再要求写短，写得耐读，就又要多下一层功夫。像日本的很多事情，在等着有人能给我们说个明白，哪怕把足够真实充分的背景材料提供给我们也好。

我们希望，收入这套丛书的每一单册，能够不炒旧饭，小题精做，拿出作者真正属于自己精心思考过的东西来，就一个日本人文题目说清楚来龙去脉。我们有心切实为文化发展做事情，就有理由相信，这套书会越出越精彩。

甲申年五月
(2004年7月)





前書き
引言 /00一

第一章

明治漢文学復興の背景
明治汉文学复兴的背景 /0一三

- 第一节 学制与汉学学塾 /0一六
第二节 诗社、文会的兴起 /0一八
第三节 出版业的繁荣 /0二八
第四节 中日文人的交流 /0四四

第二章

明治前期における主な詩人
明治前期的主要诗人 /0五三

- 第一节 明治诗宗大沼枕山 /0五五
第二节 诗坛重镇小野湖山 /0六〇
第三节 高蹈诗人鮎松塘 /0六三
第四节 幕末遗老村上佛山 /0六七
第五节 成岛柳北与《花月新志》 /0七〇
第六节 诗坛谪仙菊池溪琴 /0七八
第七节 骚坛老将风本黄石 /0八一
第八节 “亡国遗臣”大槩磐溪 /0八五



- 第九节 关西诗人草场船山 /〇九〇
第十节 晚翠吟社与向山黄村 /〇九二
第十一节 森春涛与香奁体 /〇九五
第十二节 政坛骚客 /一〇一

第三章

明治中、後期における詩壇

明治中、后期的诗坛 /一一九

- 第一节 森门四杰 /一二一
第二节 森槐南及其门生 /一二五
第三节 和文文学作家与汉诗 /一三〇
第四节 其他知名诗人 /一四三

第四章

明治文壇における

明治时期的文坛重镇 /一五一

- 第一节 重野成斋 /一五四
第二节 川田瓮江 /一五七
第三节 三岛中洲 /一五九
第四节 中村敬宇 /一六四
第五节 竹添井井 /一六八
第六节 菊池三溪 /一七三



第五章

大正、昭和前期における漢文学

大正、昭和前期的漢文学 / 一七五

第一节

知名詩人 / 一七七

第二节

文苑名家 / 一八三

結語

結束語 / 一九一

あとがき

参考書目 / 一九三

出版社の解説

引言

日本文学史界一般将明治维新（1868年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段时间，称作近代。它横跨明治、大正、昭和（前期）三个时代。本书在探讨“日本近代汉文学”的发展轨迹、主要流派、著名作家的作品及其特色等问题时，也沿用这一时代划分。

日本“上古之世，未有文字，贵贱老少，口口相传，前言往行，存而不忘。”^{〔1〕}那时候，日本列岛只有口头流传的传承文学，书面文学则是在中国的汉字传入日本后才产生的。

日本现存最早的汉文作品见于我国的《宋书·夷蛮传》。据该书记载，宋顺帝昇明二年（478），倭王武（雄略天皇）曾遣使上表，表中称自己：“封国偏远，作藩于外。自昔祖祢，躬擐甲冑，跋涉山川，不遑宁处。东征毛人五十五国，西服众夷六十六国，渡平海北九十五国……”另一方面，日本古人也在不断地摸索着用汉字记录本民族的文学作品，日本现存最早的和歌总集《万叶集》（约成书于八世纪中叶）就是用汉字（一部分司音，一部分充当语法作用）记录下来的，这就是“万叶假名”。不久，日本人又在“万叶假名”的基础上，模仿汉字的草书和楷体，创造了日本本民族的文字——平假名和片假名。《古今和歌集·假名序》（905）是日本现存最早的使用本民族文字记录的和文作品。

这就是说，日本的文学作品始终存在着两大系统：一是日本人使用本民族语言——和文创作的和文文学；一是日本人借鉴中国的文学样式，直接使用中

〔1〕 斋部广成《古语拾遗》



文创作的汉文学。直至昭和前期，这两大文学支脉相互补充，相互促进，共同创造了日本古代与近代文学的繁荣。

纵观日本汉文学发展史，从诞生到消歇，时间长达一千余年，其间的汉文学创作大体出现过四次高潮：首次昌盛于平安（794—1192）前期；第二次复兴于镰仓、室町（1192—1603，又称“中世”）中期；第三次再昌于江户（1603—1868，又称“近世”）中、后期；第四次则鼎盛于明治时期（1868—1912）。

从日本汉文学发轫至第一次繁荣，经过了漫长的准备期。据推测，雄略天皇时代，日本人尚无撰写长篇表文的能力，倭王武的表文可能出自移居日本的汉人之手。真正由日本人撰写的、相对比较通顺的汉文，大约出现于7世纪初。公元604年，圣德太子（574—622）出于约束百官、巩固政权的需要，制定了“宪法十七条”，其中的几条是这样写的：

一曰：以和为贵，无忤为宗。人皆有党，亦少达者。是以或不顺君父，乍违邻里。然上和下睦，谐于论事，则事理自通，何事不成？

……

十曰：绝愤弃瞋，不怒人违。人皆有心，心各有执。彼是则我非，我是则彼非。我必非圣，彼必非愚，共是凡夫耳。是非之理，谁能可定？相共贤愚，如环无端。是以彼人虽瞋，还恐我失。我独虽得，从众同举。

……

十六曰：使民以时，古之良典。故冬月有闲，以可使民。从春至秋，农桑之节，不可使民。其不农何食，不桑何服？

“宪法十七条”列文成章，写起来相对容易。但是，有些地方语序颠倒，如“我必非圣，彼必非愚（我非必圣，彼非必愚）”、“我独虽得（我虽独得）”“以可使民（可以使民）”等，表达并不完全准确。对于日本人来说，中文毕竟不是本民族的文字，早期的汉文出现一些类似的语病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日本现存最早的汉诗集为《怀风藻》。它成书于日孝谦女帝天平胜宝三年（751），相当于我国唐玄宗天宝十年。编者辑录了近江朝（667—672）以来80余年间64人的诗作，计120首（轶四首），兼收作者小传九篇、诗序六篇。



卷首是大友皇子作于天智七年（668）正月一日的五言《侍宴》诗：“皇明光日月，帝德载天地。三才并泰昌，万国表臣义。”天智天皇死后，皇子大海人与大友为争夺帝位，同室操戈。近江朝的汉诗几毁于兵燹。收入《怀风藻》的诗绝大部分都是奈良时代（710—794）前期的作品。由于《怀风藻》的作者大多是皇族、朝臣、留唐僧人等，因此以天皇为中心的侍宴应制、从驾游览等宫苑诗占半数以上，所以从内容上看，这部诗集具有浓重的宫廷文学色彩。在诗的形态上，《怀风藻》收五言诗109首，七言诗仅7首。诗的总体风格受我国六朝及初唐文学的影响较为明显。

至平安朝初期，经过数代人的努力，日本已形成了以贵族、官吏和僧侣为主体的汉文化阶层。尤其是嵯峨天皇（809—823在位）即位后，积极倡导汉学，竭力鼓吹“文章经国”思想，创造了举国吸收唐文化的社会机制和氛围。嵯峨天皇本人更是身体力行，率先垂范。他常召侍读为百官讲授《史记》、《论语》等汉文典籍，然后宴集群臣，一起赋诗撰文。同时，每逢一月二十日内宴、三月三曲水宴、七月七日乞巧节、春秋两季祭孔、九九重阳等庆典或节日，皇室均举行盛大诗会。并且，嵯峨天皇下令：百官朝服、宫内服饰、厅堂匾额等，一律革除旧风，均依唐制。

继嵯峨天皇之后，淳和、仁明、宇多等天皇也都承袭前朝旧制，努力吸收大唐文化，视汉学为官方正学。其时，朝野上下，人人争习汉籍，百官争诵汉诗，汉学成为皇族以及王公、大臣的必备修养。天皇诏书使用汉文，大臣们记日记也使用汉文，宫廷内外形成了浓郁的汉学气氛。因此，后人把平安前期，尤其是九世纪这段时间称作“讴歌唐风时代”。

在这种举国吸收唐文化的大背景下，嵯峨天皇命人编选了汉诗集《凌云集》（814年）、《文华秀丽集》（818年），淳和天皇命人编选了奈良至平安初期的汉诗文总集《经国集》（827年），后人习惯上把它们合称为“敕撰三集”。敕撰汉诗集的问世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这说明当时的汉文学已经超越了和歌等文学样式，高居于庙堂之上，成为日本的主流文学，乃至最高文学了。

由《怀风藻》演进至“敕撰三集”，仅用了五六十年时间。与前者比较，“敕撰三集”时期，七言诗急剧增加，学习、模拟对象也由五、七言古诗逐步转向了初唐近体诗。这说明日本古人已经跨越汉语的音韵障碍，基本上掌握了近体诗的平仄规则，能够比较熟练地创作律诗了。不仅如此，而且还出现了数



量较多的杂言、乐府体长诗，有的甚至长达三四十句。可以说，其遣辞造句、叙事议论的能力已经实现了划时代的飞跃。

“讴歌唐风”的文化氛围和“敕撰三集”的诞生，为平安朝汉文学的全面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随之出现了一批著名诗人与作品，如都良香（834—879）《都氏文集》、岛田忠臣（？—891）《田氏家集》、菅原道真（845—903）《菅家文草》、《菅家后集》等等。另外，藤原佐世（？—897）、纪长谷雄（845—912）、三善清行（847—918）等，也为平安时期汉文学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其中，菅原道真不仅是平安朝，也是日本汉文学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诗人。道真出身于家学世家，自曾祖父起，祖上三代都是文章博士，并办有家学，门生遍及朝野。他本人也继承父祖之业，经文章博士，历任翰林学士承旨、遣唐大使（未成行）、权大纳言等，累官至右丞相，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二位文人出身的从二品大臣。但是，由于道真出身儒门，政治上没有强势家族作靠山，所以先后两次被谪贬边塞，最后死于流放地——九州太宰府。然而，坎坷的人生反而造就了这位伟大的诗人。道真的作品大体可以分为两部分：一是在朝为官时创作的作品。这类作品上承中国六朝宫体诗的余风，近继温庭筠等中唐诗人的绮靡诗风和浓重的感伤情调，表现出平安朝贵族典雅、细腻的唯美主义倾向。他的这种风格对日本后世和文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另一类是他在谪贬时期创作的讽喻诗。仕途上的极度失意，使他开始把目光转向残酷的现实和食不果腹的贫民百姓。因此，道真得以摆脱贵族式的缠绵悱恻，以“救济人病，裨补时阙”的创作理念，给自己的作品注入了生命和灵魂。应该说，道真的这类现实主义作品，在唯美至上的审美理念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日本文学史上，无疑是非常宝贵的存在。

菅原道真逝世不久，日本第一部敕撰和歌集《古今集和歌集》（905）问世，物语、日记等体裁的文学作品相继诞生，和文文学逐步趋向繁荣。江村北海（1713—1788）曾就日本中古、中世时期的汉文学发展脉络论道：“盖古昔之文学，盛于弘仁、天历（810—975），陵夷于延久、宽治（1069—1092），泯没于保元、平治（1156—1159）。于是，所谓五山禅林之文学，代而兴之。”¹⁾“五山禅林”文学，指的是日本中世时代，以镰仓、京都的五大禅院的高僧为中心而创作的汉文学。它的勃兴，使日本迎来了汉文学史上的第二次繁荣。

（1）江村北海《日本诗史》（卷2）